

中晚唐中原藩镇“防秋”问题的历史考察^{*}

朱德军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西安文理学院 历史系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 为了平叛的现实需要, 大量征调西北边兵驰援中原战场, 使得关中地区兵力空虚; 而此时处于极盛时期的吐蕃王朝勾结边境诸胡趁势内侵, 京师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随后, 唐中央为弥补关中军力不足的难题, 从地方大量征调军队进行防秋。本文以明确的史料记述为依据,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对“防秋”兵力的来源、“防秋”兵力的规模进行动态考察, 并探讨中原藩镇在“防秋”中的价值与局限。

关键词: 中原藩镇; 防秋; 来源; 规模; 价值与局限

中图分类号: K24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1)02-0092-07

“防秋”^①, 作为中唐以后出现的颇为独特的历史现象, 它是安史之乱爆发后, 中央为了平叛的现实需要, 被迫在边境地区收缩防线, 内调西北边兵“入靖国难”^{[1] 卷196上 5236}, 而造成边防空虚; 而此时, 处于极盛时期的吐蕃王朝勾结边境诸胡趁势内侵, 京师的安全形势岌岌可危。讨平安史之乱以后, 京师长安与西北地区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并没有随之消失, 相反, 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当“河西、陇右不守”^{[2] 卷37 960}, 使得唐王朝在西北地区失去了战略上的支撑点, 国家的政治中心关中遂暴露在其兵锋的直接威胁之下。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务, 并有效拱卫京师的安全, 国家不仅重建中央禁军, 还大力加强西北藩镇兵的建设。即便如此, 以其有限的兵力仍无法有效地阻止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入侵, 因此, 唐王朝不仅需要调集各地军队驰援边疆, 更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制度性的边防体制, 而“防秋”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一、西北“防秋”兵力的来源

唐代“防秋”的兵力, 即所谓的“防秋兵”, 通常来自于“关东”地区, 它们主要由外镇神策军、边境藩镇兵与“关东防秋兵”三个方面的部分兵力构成^[3]。其实, “关东”作为一种非常宽泛的地理概念, 一般作为函谷关、崤山以东地域广泛的中原、河北、江淮等区域的统称, 故“关东防秋兵”就是受命赴边执行戍防任务的中原、河北、南方藩镇兵的统称。史籍对于关东防秋兵多有记述, 但在不同的史料中往往不尽相同, 如《资治通鉴》胡注曰“唐建中初, (盐州) 为吐蕃所陷, ……由是银、夏、宁、延泊于灵武, 岁以河南、山东、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万分护其地, 谓之防秋。”^{[4] 卷268 8748}。这段文字载于德宗建中之际, 它记述中央在上述地区布置防秋的情况。然而, 贞元八年(792), 宰相陆贽在谈到河陇等地的“防秋兵”时, 竟泛泛地称为“皆河南、江淮诸镇之军也”^{[1] 卷139 5804}。实际上, 陆贽的说法既不准确, 也不够全面。为了研究的方便, 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合理的界定^②。那么, 何谓“防秋兵”? 笔者认为“防秋兵”就是唐代用于边境“防秋”活动的兵员, 它们由中央制度性地从各地征召兵力赴边御敌, 或边境部队出镇戍守, 它们常常以“出征、征行”为表征, 具有不太固定的屯防区域与比较固定的驻防期限(通常以三年为期), 故唐代的“防秋兵”其实是历史上行营兵的一种, 属于临边御敌之野战兵团, 而非单纯的边境驻(屯)防兵, 与唐代前期的行军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③。

基于诸史在记载藩镇“防秋”活动时, 一般只与特定的时空内的特定事件相联系, 即单一史籍的记载, 很难比较全面地展现关东藩镇参与“防秋”的情况, 自然也就不可能反映它们在“防秋”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 很有必要对与此相关

收稿日期: 2010-12-24

作者简介: 朱德军(1969-), 男, 安徽滁州人, 隋唐五代史博士,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宋史研究人员, 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唐宋军事史、中国古代政治史。

^{*} 本文系第48批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唐宋变迁视域下的西北防御体制研究”(资助编号: 20100481358)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9重大项目“西北地区在历代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项目编号: 2009JJD77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史料加以梳理 ,并进行适当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而广德元年至乾符元年(763 ~ 874) ,正是我们下面列表需要分析的范围。

唐代关东“防秋”兵力来源一览表

防秋时间	防秋地点	防秋兵来源	防秋将领	资料来源
广德元年 (763)	好畤	兖 郛	邢君牙	《旧唐书》卷 144《邢君牙传》 《新唐书》卷 156《邢君牙传》 《册府元龟》卷 385《将帅部·褒异十一》
永泰元年 (765)	泾 阳、东 渭 桥、云 阳、便 桥、盩 厔、凤 翔、同 州、 坊州	河中、淮西、渭北四镇 行营、神策军陈郑、同 华、鄜州	郭子仪、李忠 臣、李 光 进、 马 璘、骆 奉 仙、李 抱 玉、 周智光、杜冕	《旧唐书》卷 120《郭子仪传》
大历二年 (767)	宜禄	朔方军	浑瑊	《旧唐书》卷 134《浑瑊传》 《册府元龟》卷 385《将帅部·褒异十一》
大历四年 (769)	咸阳	和州(江南西道)	张万福	《全唐文》卷 560 韩愈《顺宗实录四》
大历初		永平	令狐彰部将	《新唐书》卷 148《令狐彰传》 《资治通鉴》卷 224 大历八年二月
大历中	陇州	泽潞	曲环	《新唐书》卷 147《曲环传》 《旧唐书》卷 122《曲环传》 《册府元龟》卷 385《将帅部·褒异十一》
大历八年 (773)	宜禄		浑瑊	《新唐书》卷 138《马璘传》
大历九年 (774)		汴宋、淄青、幽州河 阳、决胜军、淮西；淮 南、两浙、魏博、昭义、 成德、荆南、湖南、山 南、两川、鄂岳、宣歙、 福建、岭南	朱 泚 郭子仪 李抱玉 马 璘	《资治通鉴》卷 225 大历九年二月 《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五》 《旧唐书》卷 200 下《朱泚传》 《新唐书》卷 225 中《朱泚传》 《旧唐书》卷 11《代宗纪》 《全唐文》卷 47《命诸道入钱备和采诏》
大历十年 (775)		河阳	常休明部将	《资治通鉴》卷 225 大历十年二月
贞元元年 (785)	京西、鄜州	陈许、淮西		《旧唐书》卷 130《李泌传》 《新唐书》卷 139《李泌传》
贞元初	长武城	陈许、淮南、浙西	韩全义	《全唐文》卷 531《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
贞元三年 (787)	潘 原 堡、陇 州、鄜州、灵 宝、麟游	决胜军、神策军；宣 武、淮西	唐 良 臣、刘 昌；吴 法 超、 苏 浦	《册府元龟》卷 124《帝王部·讲武》 《资治通鉴》卷 232 贞元三年正月 《册府元龟》卷 401《将帅部·行军法》
贞元四年 (788)	长武城	陈许	韩全义	《旧唐书》卷 196 下《吐蕃下》
贞元十年 (794)		宣武	李万荣部将	《旧唐书》卷 145《刘玄佐传》
贞元末	良原	华州	骆元光	《新唐书》卷 165《高郢传》
元和初	剑南东川	太原、凤翔、神策军		《全唐文》卷 626《代李侍郎论兵表》

续表

元和九年 (814)	丰州	河东	刘 辅	《旧唐书》卷 15《宪宗纪下》
元和十四年 (819)	盐州 邠宁	陈许	李光颜 王 沛	《旧唐书》卷 161《李光颜传》 《旧唐书》卷 161《王沛传》
长庆元年 (821)		淮南、忠武、武宁、兖 郛、淄青、汴宋、泽潞、 河阳、郑滑		《唐会要》卷 72《马》 《全唐文》卷 67 穆宗《优恤将士德音》
会昌二年 (842)	河东	陈许、汝州、郑滑、徐 州、襄阳	康志亮 李彦佐	《全唐文》卷 705《请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状》 《全唐文》卷 699《赐彦佐诏意》 《全唐文》卷 703《请于太原添兵备状》 《资治通鉴》卷 246 会昌二年七月
太和四年(830)	西川	陈许、河中、郑滑		《资治通鉴》卷 244 太和四年十月
大中~咸 通年间	凉州	天平		《资治通鉴》卷 278 长兴四年二月
乾符元年 (874)	灵武 西川	感化		《资治通鉴》卷 252 乾符二年三月

注 1: 本表藩镇类型的划分借鉴张国刚《唐藩镇研究》的研究成果,但本表藩镇的分类标准完全基于藩镇所处的地域分野而定,迥异于张著兼顾藩镇政治取向的分类法。

注 2: 因朔方、邠宁、渭北、鄜州、同华、四镇行营、神策军因不属于唐代“关东”兵员的范畴,故不予考量。

注 3: 唐代中原藩镇名称,时常存在着同镇异名的情况;不同的时期名称改易的情况也较为常见,为不致误解,特一一注出:如汴宋(宣武)、泽潞(昭义)、郑滑(义成)、襄阳(山南)、陈许(忠武)、徐州(武宁、感化)、太原(河东)、永平(滑亳),而决胜军则属于神策军系列。

根据上表,在唐代百年的防秋历史中,实际上,关东藩镇有明确“防秋”的记录不下 56 次,中原藩镇直接参与了其中的 30 次,占整个次数的 53.5%,河北藩镇出兵 11 次,占出兵次数的 19.6%,而南方藩镇则 15 次,占整个次数的 26.8%,显然,中原藩镇是关东防秋兵力的主体。而中原藩镇中的忠武(即陈许 8 次)、宣武(即汴宋 4 次)、淮西(4 次)、武宁(即感化、徐泗、徐州 3 次)、义成(即郑滑 3 次)、河阳(2 次)。忠武军,它不仅为中原防秋最为频繁的藩镇,也是所有藩镇中出兵次数最多的。杜牧在《忠武军都押衙检校太子宾客王仲玄等加官制》中称“自艰难以来,言念许师,何役不行,何战不会?居常则长法知礼,临敌则致命争登,鏖于和门,不忝忠武。尔等短衣长剑,事寇乘边,触履艰危,无所顾虑”。唐人封敖同样对其称赞有加“今以忠武师徒,始终诚节。南征北伐,每闻尽瘁之诚;破敌摧坚,必茂策勋之典。”^[5]卷 20,1273。

在唐代“防秋”历史中,代宗永泰元年、大历九年,德宗兴元、贞元之际是吐蕃等游牧民族进犯关中最为猖獗的时期。会昌二年,回鹘则屡犯河东,在这些危急关头,甚至平日较少出兵“防秋”的河朔、江淮藩镇纷纷为捍卫大唐帝国而踊跃出兵,表明即使是“叛逆”的河朔藩镇也并不完全否认唐廷的权威。然而,河朔藩镇对中央支持的力度毕竟有限,而且多在两者关系比较和缓的时候。至于南方藩镇,因长期存在兵力“薄弱化”的问题,军队的战力也乏善可陈^[6],故常常遭到诸镇的轻视,如南方地区“防秋”最为卖力的淮南镇,史称“淮南兵绵弱,郢人素易之。”^[2]卷 154,4879 即是明证。中原藩镇不仅战力强劲,而且比较忠于大唐,故常常发挥诸军先锋的作用。

对于边境藩镇兵与外镇神策军,若中央发布征召命令,它们也偶有出镇的记录,如元和初年,“发更太原、凤翔及神策诸镇兵赴剑南东川者……若闻发兵西南,多取边镇。”^[7]卷 626,6323-6324。至于中原藩镇的戍防之地,可根据实际的需要,随时移驻他方,如会昌年间,回鹘部族零落,朝廷虑其“逗留塞上,谋陷丰州”,河东又过于兵力薄弱,故征发忠武、义成之兵至太原屯集,中央指示“如河西有虞,便令取(陈许、郑滑)岚石路过河,于亦近便。”^[7]卷 703,7218。中原不少藩镇几乎每年都要派兵赴边,如大历以来,永平军“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4]卷 224,7219-7220。广德初年直至乾符元年,有唐一代中央组织的防秋活动,可以说从中原藩镇开始,以中原藩镇结束,中原藩镇全程参与其中^④,是唐代“防秋”行动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二、唐代“防秋”之兵力

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原藩镇在唐代防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必要对有唐一代“防秋”兵力的总体规模以及中原藩镇、边境藩镇、中央神策军在历次“防秋”行动中的出兵数量、频率进行必要的考察,以确定它们在这些活动中的作用与表现。

关于唐代“防秋”兵力的考察,学者曾超对此曾作过大致的推断^[3]。然而,曾氏关于“防秋”兵力的估量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究其原因,实由对“防秋兵”的概念界定有待商榷。他将边境的驻防兵(边境藩镇兵、神策屯营)与“防秋”行营兵不加区别。事实上,它们属于两类性质不同的兵员。

(一)“防秋”兵力的整体规模

关于唐代防秋兵力的规模,永泰与大历年间诸史不载,而对大历九年则多有记述。该年郭子仪入朝,代宗召对于延英,每每谈及西北的边防。退朝后,他“上封论备吐蕃利害”,提到其部朔方军在开元、天宝之际“战士十万,战马三万”。由于参与“收复两京,加之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尤其京西北四镇,往往“每将盈万,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1]卷120,3464。郭子仪认为当时游牧民族兵强马壮,唐王朝只应采取守势战略。该年,京西北四镇——凤翔、泾原、朔方、河东,其兵力大体相当,所谓“每将盈万”,即每镇的兵力大体为一万人。此时,朔方军力仅为天宝时“战士十万”的“十分之一”,亦为一万人,实际上在重复“每将盈万”的说法。其实际情况与郭子仪在稍前的大历二年九月,诏“子仪以步骑三万自河中移屯泾阳。……三年九月,诏子仪率师五万自河中移镇奉天”所载的数字相差悬殊,可知郭子仪颇有夸大之嫌。笔者认为该军兵力三万的规模应该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故当时的四镇兵力至少在十二万人以上。郭氏之所以低估其部及其他三镇的军力,可能为了规劝代宗皇帝建立“防秋制度”的初衷有关。他敦请朝廷“更询说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道必矣,未可失时。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镇数千,大镇数万,空耗月饷,曾不习战。臣请抽赴关中,教之战阵,则军声益振,攻守必全,亦长久之计也”^[1]卷120,3464-3465。他规划“诸道”防秋的规模为“四五万”人,要求朝廷将其“抽赴关中”御边。对于郭氏的建议,代宗在诏书中赞扬他“忧深虑远,殊沃朕心”^[8]卷366,4362,完全接受他的建议。《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略曰:

(大历)九年四月,以吐蕃侵扰,预为边备,乃降敕“宜令子仪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众,严会栉邑,克壮旧军。抱玉以晋之高都,韩之上党,河、湟义从,汧、陇少年,凡三万众,横绝高壁,斜界连营。马磷以西域前庭,车师后部,兼广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万众,屯于回中,张大军之援。忠臣以武落别校,右地奇锋,凡二万众,出岐阳而北会。希让以三辅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阳、幽蓟,总四万众,分列前后。魏博、成德、昭义、永平总六万众,大舒左右。……”

根据上述文字,我们得知:郭子仪、李抱玉、马磷、李忠臣统帅所部实际上就是西北四镇的军队,它们分别由朔方军、河西陇右、安西北庭与其它安史之乱前的旧部组成,若以每镇3万计,合计13万人,以关东藩镇兵为主体的戍卒加上近畿六州的兵力则为10万,即关东“防秋兵力”不足10万人。

此时,重建西北藩镇已经告一段落,但关中局势仍持续紧张,边境藩镇兵多为行营兵,故上述诸军应基本上属于“防秋兵”的范畴,这里既包括边境的藩镇兵,也包括关东的防秋兵,其中属于四镇军队13万^⑤,与前文笔者的推断完全吻合。关东防秋兵力10万,防秋总兵力23万。《全唐文》卷四八《命郭子仪等备边敕》也同样记载该年诸军“防秋”兵力的配置状况,其文字稍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忠臣以卢龙柳城,泊北平,汧东诸镇,江黄申息之师,凡三万众”,即李忠臣所部的3万亦属关东防秋兵,该文所载的边境藩镇11万,关东防秋兵则为13万人,合计总兵力约为24万。上述材料不载中原防秋兵的数量,《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亦载曰:

大历九年五月,四海之内,方协大宁,西戎无厌,独阻王命,不可忘战,尚劳边事。……每道岁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其岭南、浙东、浙西,亦合准例。

如前文所述,关东“防秋兵”由中原、河北、南方三地的藩镇兵构成,而这里仅胪列河北与南方的兵员,却未计入中原藩镇兵的数量。在这段文字中,即使不包括岭南、浙东、浙西三道的兵员,兵力也达到37000千人,若计入应不低于4万人,故中原藩镇“防秋”兵力大致为9万人。

需要说明的是,自永泰元年(764)吐蕃入寇,此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2]卷50,1334,故神策军,尤其外镇神策军(又称神策行营),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防秋”力量。但是,神策行营并不等于行营兵,因为神策行营一般包括“神策征讨行营”、“中央欲加强对控制与边防有关诸镇”、“神策遥隶行营”三类^[9]48-49,而充当行营兵的主要是前者,而后两者则徒有其名,实际上仍是西北藩镇兵的一种。此时,神策军的数量诸史不载,但贞元十四年,该军“乃至十五万”^[2]卷50,1334。后来,不断有西北藩镇遥领于神策行营,此时神策军的数量远不及贞元十四年的非常时期,我们若以当时2/3的规模估计,即时神策军应为10万人。由于神策军作为当时国家的中央军,具有“禁卫和征伐双重性质”^[10],其职责主要是驻守京师并宿卫于宫禁,故充当外镇行营的数量理应不超过总数的一半(即5万)。又因为京西北藩镇兵、外镇神策军并不都是“防秋兵”,若以其2/3的规模出镇,则总兵力当为11万人,整体规模虽稍逊于关东,但仍多于中原地区。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大历九年“防秋兵”总体规模当为24万左右,而其中的中原防秋兵,在另两种兵员即使以2/3规模出镇的情况下,中原藩镇也可达其兵力的37.5%。

德宗兴元、贞元之际,由于关中局势更加严峻,“防秋”的兵力急剧膨胀。建中初年,时(盐州)为吐蕃所陷,……由是银、夏、宁、延泊于灵武,岁以河南、山东、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万分护其地,谓之防秋”^{[4] 卷268 8748}。根据上述文字,关东“防秋兵”在“银、夏、宁、延泊于灵武”的范围内,应该是当时关中边境一线的“防秋”兵力,而处于京畿的凤翔、泾原、鄜坊、同华及京兆的兵力并未包含在内。贞元三年(768),代宗与宰相李泌谈到“复府兵之策”时,李泌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4] 卷232 7493}。这17万人应是全部关东防秋的军力,其中有13万人集结在京畿重地。从上述两则史料,我们不难发现京西北的“防秋”,日渐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即唐中央开始从关注边境的“防秋”向更重视京师安全的二线防卫转变。正如元和之际的白居易,在《新乐府·西凉伎》中所描述的那样“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1] 卷427 4702}。笔者对诗人笔下“缘边”一词的理解,并非指表面文字上的国境一线而言,而实际指代近畿。由于此时唐朝与吐蕃等民族的关系相对缓和,一线军力的增强以及二线布防的卓有成效,造成京畿从贞元以后基本无战事,再也没有发生如广德元年的京师陷落,皇帝仓惶“出幸”^{[1] 卷184 4763}的事件,使得十万之众的防秋军人过着无所事事“饱食温衣闲过日”的生活,所谓“空耗月饷,曾不习战”^{[8] 卷366 4362}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唐代“防秋制度”对拱卫京师安全的有效与成功。

(二) 中原藩镇“防秋”的规模

中原藩镇作为一个整体,其“防秋”的兵力上文已论,然而,单个藩镇“防秋”的规模我们并不清楚,故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对于“防秋”的规模,诸史述及虽多,但是具体而明确地记述每次“防秋”中诸镇出兵的史料却非常有限,下文以代、德、宪、文、武、宣六朝为例略作论述。

大历三年(769),代宗令和州刺史张万福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7] 卷560 5667-5668}。大历中,永平军节度使令狐彰“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4] 卷224 7219-7220}。九年二月,“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逃归^{[4] 卷225 7225-7226}。同年,诸道“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义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东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剑南西川三千人,东川二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1] 卷11 304-305}。十四年八月,吐蕃来寇,朝廷“发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讨,大破之”^{[1] 卷196下 5245}。

建中初年,吐蕃“寇剑南,诏(曲)环以邠、陇兵五千驰救”^{[2] 卷147 4759}。兴元二年(784),“陈许戍边卒(防秋兵)三千自京西逃归”^{[1] 卷130 3622}。贞元元年(785),淮西“防秋”于鄆州,已而“四千人亡归”^{[2] 卷139 4635}。三年正月,淮西归国,朝廷“诏发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4] 卷232 7478-7479}。同年,宣武兵马使刘昌“以偏师八千承诏护塞”^{[7] 卷499 5087-5088}。十年,宣武留后李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1] 卷145 3933-3934}。

元和十四年(819),吐蕃入寇,宪宗命李光颜筑城于盐州,“仍许以陈许六千人随赴邠宁”^{[1] 卷161 4221}。太和四年(830),南诏寇川,中原发兵驰援,虽不敢动,但在中原大部北返之际,唯留“河中、陈许三千人”,人心惶惶,川帅李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4] 卷244 7872}。会昌三年(843),回鹘寇边,因虑其“逗留塞上”,河东又兵力单薄,宰相李德裕请求“发陈许步军三千人,郑滑步军三千人,令至太原屯集”^{[7] 卷703 7218}。大中年间,张义潮在河西,时“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4] 卷278 9082}。

如果大历三年至大中之际中原藩镇“防秋”活动(以各镇,每次出兵为计)进行统计,其间共出兵33次,人数最多达八千人,最少五百人,一千至三千规模的有23次,占整个数量的69.7%,四千至八千人9次,占整个数量的27.3%,而低于千人规模的仅1次。在这些“防秋”行动中,中原藩镇直接参与了14次,占总次数的42.4%,其中以三千人以上规模为主,共10次,占其出兵数量的71.4%,而低于三千人规模仅4次,占28.6%。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述有案可查的关东“防秋”行动中,中原藩镇无疑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出兵的规模也远较其他地区的藩镇为多。

三、中原藩镇“防秋”的价值与局限

就中原藩镇出兵“防秋”的本身而言,就是它们在政治上拥戴中央的集中体现,对大唐帝国来说,它们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存在着种种的局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中原藩镇防秋的价值

首先,对中央而言。中原藩镇军队西调入关,并以其为核心组建国家的防秋兵,是唐王朝构建以京师为中心的“京师神策军—关东防秋兵—边境藩镇军”三级圈层防卫体系关键的一环,具有层层拱卫长安的战略意义。中原藩镇的防秋,不仅成功地遏制了游牧民族对唐代政治中心关中的军事威胁,使得吐蕃王朝的东寇、南侵变得更加困难。“三级圈层防卫体系”的成熟之日,也就是唐代游牧民族进逼京畿一去不返之时。同时,大量以行营形式出现的防秋兵,让它们驻守京畿,可以确保中央拥有一支有效的机动军力,以应付各种形势的挑战,譬如震慑藩镇。若遇非常情况,可以直接征调它们出征,尤其对付河朔藩镇。如建中二年(781),李正己、田悦举兵为乱,“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1] 卷12 328}。三年,河朔诸镇或移兵中原,或加兵于河上,中原大扰,朝廷诏移“京西戎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1] 卷144 3915}。四年三月,李希烈谋反,时诸军对峙于河朔,中央深感兵力不足,乃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4] 卷228 7341},上文的戎兵与行营兵实际上就是“防秋兵”。

其次,对边境藩镇而言。一方面,中原藩镇出兵“防秋”,极大地弥补了御边军力不足的难题,形成对边境强有力的军事支持,可以使其“与(边疆)节度使犄(犄)角相应”^{[4]卷239,7698}。另一方面,对京西北藩镇也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作用,消弭了关中藩镇拥兵自重并走向割据的可能,从而确保中央对这一核心区域的牢固控制,不仅使唐王朝安然地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危机,而且能在游牧民族进犯的军事危机中长期维持社会稳定。

再次,对中原藩镇自身而言,征调兵力防秋,可以适当地让地方“祸水西移”,不失为解决中原骄兵致乱的重要手段。如贞元十年,宣武帅李万荣在“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时,有意识地将“骄纵横暴”的刘士宁亲兵三百人“悉置行籍中”^{[1]卷145,3934},让他们到边疆建功立业。从某种意义上,这是除了诛戮之外较好地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也有利于缓解中原藩镇“销兵”的难题。在安史之乱期间,中原一直是双方争夺的战场,藩镇不得不大量招募人员从军,使得该地区成为唐代拥军最多,军队数量最为密集的区域^[12]。然而,削平安史之乱以后,如何处理这些“不用之军”^{[4]卷223,7173},则屡屡困扰着王朝政府,经常而周期性地派兵“防秋”,不失为解决该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由此一来,防秋的军费虽仍由本镇负担,但中央毕竟也提供一部分费用,可以部分地纾缓了因军队过多,藩镇无力供养的问题。

(二) 中原藩镇防秋的局限

首先,中原防秋兵,原则上他们是“为备御吐蕃”等游牧民族而存在,更多地体现出其防御的属性。在唐代“防秋制度”完全确立之后,在京畿地区驻防中原防秋的兵力就达到十万之众,这些骄兵更多地用于防守京师,而是不用于进攻游牧民族并收复失地,它们虽具有明显军事优势,却长期采取战略防御态势^[13]。他们“鲜衣美食,坐耗县官”^{[4]卷239,7998},无疑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严重地损耗王朝的综合国力,使得大唐帝国“中兴”的希望遥遥无期。

其次,中原藩镇在内防秋兵,其军队的统属关系极为复杂,或由本镇派出的将官统辖,或统之于驻地之藩帅,或归之于神策军中尉,所谓“力分于将多”^{[1]卷139,3804}。不仅中原防秋兵、边境藩镇军、中央神策军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即使中原地区各藩镇之间也难以很好地配合,在相互“牵制”与“制衡”中锐气荡然。

再次,中原防秋兵所居之处,与“百物阜殷”的中原相比,“千里萧条,……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覘。日有剽割之虑,永无休暇之娱……从军之徒,尤被优养,惯于温饱,狃于欢康,比诸边隅,若异天地”。他们“进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处之以严宪。其来也,咸负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计归,张顺待饬,徼幸者犹患还期之赊缓”^{[8]卷993,11658-11659}。严酷的戍边环境,加上将帅约束不严,常常发生“戍边之卒”的“亡归”事件,如兴元二年六月的忠武军^{[1]卷130,3622}、贞元元年的淮西兵^{[2]卷139,4635},中央对这些“溃卒”一般采取“尽诛之”,或“悉击杀之”的手段加以制止,仍难以激起军人的斗志,以致在长庆元年(821)正月,灵武节度使李听上疏唐中央,提议将这些长期“不习边事”^{[14]卷72,1304}关东防秋兵的“衣赐月粮”赐予当道,由它们自行招募本地人员取代,表明中晚唐的“防秋制度”已开始走向没落。

注释:

- ①关于唐代“防秋”问题的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为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的《唐代的防秋兵与防冬兵》(《集刊东洋学》1980年,第42、43号)。稍后国内学者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及曾超《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唐代防秋兵力考证》(《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试论唐代中期边兵的重建》(《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对这一问题均有论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上诸家对“防秋”的概念界定有待商榷,造成的结果就是对防秋兵力的推断有误;同时,对中原藩镇兵在“防秋”行为中的地位与作用缺乏关注。
- ②关于“防秋”与“防秋兵”的概念,古人只泛泛而论,能够对此进行理论概括应是今人的贡献。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是国内学者齐勇锋先生,他在《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中认为“防秋”就是指“中晚唐在长安西北防遏吐蕃的军事行动”,“防秋制度”则是在防遏吐蕃过程中,唐在京西北地区所形成的军事屯防制度”。其后,曾超在《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中指出“中晚唐时期,为备御和遏制吐蕃频繁的军事攻势,唐代宗在重建西北、西南边防过程中创建了防秋兵和防秋制度……唐王朝就把防御和遏制吐蕃秋冬发动的军事攻势称为‘防秋’,用于‘防秋’的军队也就被称为‘防秋兵’了”,作者亦未明言“防秋制度”的内涵,但在随后的诸文中事实上附和了齐勇锋先生的见解。他们虽从一定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问题,但是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明显的值得商榷的地方,故笔者重新进行探讨。
- ③参见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217-237页。
- ④关于唐代的防秋之始,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的广德元年,吐蕃、党项入寇京畿,代宗仓惶“出幸”陕州,中央不得不从中原战场抽调平卢军西进,令兵马使邢君牙“领防秋兵入镇好时”(详见《两唐书·邢君牙传》),其后一直延续,直至唐末的乾符元年。《通鉴》载“去岁,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详见《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三月)。也就是说,唐代的“防秋”应始于广德元年(763),终于乾符元年(874),至少存在110多年,其始于中原藩镇,亦终于中原藩镇。

- ⑤剑南西川处于唐代西部边境,属于“西抗吐蕃,南抚蛮獠”(详见《旧唐书》卷38《地理一》;又见《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正月条)的雄镇,由于一直面临吐蕃与南诏的双重压力,防守本镇尚且自顾不暇,更无力出镇防秋,故推算边境防秋兵力时不将其计入。

参考文献:

-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曾超.唐代防秋兵力考证[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1).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杜牧.撰.何锡光.点校.樊川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7.
[6]朱德军.等.关于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J].人文杂志,2008(1).
[7]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
[10]齐勇锋.中晚唐防秋制度探索[J].青海社会科学,1983(4).
[11]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朱德军.唐代中原藩镇军额与军费问题初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2).
[13]曾超.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2).
[14]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Historical Research on “Autumn Defense” of Pan Towns of Central Plains in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and the Later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ZHU De-jun

(School of History , Northwest University , Xi'an , Shaanxi , 710069; Department of History ,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 Xi'an , Shaanxi , 710065)

Abstract: After An Lushan's Rebellion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Tang Dynasty called up large number of armed forces in northwest border and aided the battleground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e decision reduced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During that period , the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Tubo regime invaded Tang with other national powers. The Capital of Tang , Chang'an , became very dangerous. T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sembled local forces for Autumn Defense.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the essay studies the reason , the scale ,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utumn Defense.

Key words: Autumn Defense , reason , scale ,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

(责任编辑 张玉海)